

长江经济带文化资源分布态势及归因

——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例

李畅¹

【摘要】长江经济带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区域，文化资源富集，极具研究价值。本文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称“国保单位”)为载体，采用空间地理分析方法，探析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分布差异及归因。研究发现：在时间态势上，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国保单位呈现出“七起六伏”的数量变化，其分布重心的迁移距离亦有变化；在空间态势上，国保单位沿长江水系呈“东密西疏”的鱼骨状分布，并亲水聚集；在类型特征上，国保单位的类型分布具有集中化的结构特征，其中古建筑占据数量优势；在归因解释方面，自然环境的水系指标、社会环境的文化指标对国保单位的分布差异具有高解释力。在此基础上，提出集群发展、固本强基和数字集成的策略，旨在为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保护及传承提供学理依据。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 文化资源 时空分布 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空间地理分析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22)07-0163-10

长江经济带是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同时也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区域。自西而东的长江，横跨了巴蜀、荆楚、吴越三大区域文化，以及滇、黔、赣、徽等亚文化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国家文化强国的重要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重要指示的引领下，保护和传承长江经济带各类文化资源，促进长江经济带区域的文化发展极为重要¹。

长江经济带文化资源是人居文化、产业文化、历史文化、精神文化等内在水文化基因的资源呈现，主要涉及物质实证文化资源、文字与影像记载性文化资源、行为传递性文化资源等类型，是区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在长江经济带社会发展、产业经济、生态环境等战略研究的基础上²，诸多学者从长江经济带文化分区³、非物质文化遗产⁴、历史聚落⁵等方面研究了长江经济带在某个历史时期和区域流域中的文化现象、文化要素、分布规律和保护策略等。这些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非物质文化资源和聚落文化资源，侧重于时间、空间的单维度分析，鲜有对典型物质文化资源，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称“国保单位”)的关注。事实上，国保单位作为国家文物局所核定不可移动文物的最高保护级别，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描述其在历史时空中的分布特征，对于揭示区域文化的演进规律，保护和传承区域文化资源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⁶。因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为研究对象，拟采用点状核密度分析、线状缓冲区分析和重心迁移模型等空间地理分析方法，描绘其分布的时间态势、空间态势和类型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国保单位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及解释力，旨在为长江经济带文化资源的协同发展和精准活化提供理论参考和数据支持。

一、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空间地理分析的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¹作者简介：李畅，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博士苏州 215011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长江文化研究”专项项目“长江文化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研究”(21CJB006)的阶段性成果

根据长江水系流域特征和区域文化地理特征，长江经济带可分为三个区域。上游为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地区，以巴蜀文化、滇文化和黔文化为主。中游为湖南、湖北、江西地区，以荆楚-湖湘文化为主。下游为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地区，以吴越文化和皖文化为主。研究采用的国保单位数据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核定公布的名录⁷，共涉及国保单位1851处，占全国总数的36.93%，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等五个类型⁸。本文的空间矢量数据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全国行政区划分信息查询平台。长江干流与主要支流的数据，均采用省级行政区域。此外，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国保单位分布差异的相关影响因素数据，如人口、经济、文化等数据均来自官方统计数据⁹。

(二) 主要研究方法

本文以ArcGIS(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分析为主、常规数理统计为辅进行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分布态势及归因研究，主要涉及点状核密度分析、线形缓冲区、重心迁移模型、地理探测器、集中化指数等研究方法。

1. 点状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主要用于评估资源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的密度及集聚性。本文采用点状核密度分析可以直观反映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时空分布集聚程度及特征¹⁰。其公式为：

$$f_n(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x_i}{h}\right) \quad (1)$$

式(1)中， $k\left(\frac{x-x_i}{h}\right)$ 表示核函数， $h>0$ 表示带宽， n 为国保单位总数， $(x-x_i)$ 表示估值点 x 到国保单位点 x_i 的距离。

2. 线状缓冲区分析。

缓冲区分析主要用于评价资源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的辐射程度。本文采用线状缓冲区分析可以统计在一定范围内长江主线及两侧支流的国保单位数量¹¹。其公式为：

$$B_i = \{x : d(X_i, Q_i) \leq R\} \quad (2)$$

式(2)中， Q_i 为长江干流及一级支流， X_i 为邻域内国保单位的坐标点， d 为最小欧式距离， R 为长江干流及一级支流两侧的缓冲半径。

3. 重心迁移模型。

重心迁移模型主要用于分析区域资源要素的时空变迁规律，本文采用重心迁移模型分析可以描述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在历史演进中的空间变化轨迹。其公式为¹²：

$$\bar{x} = \frac{\sum_i^n m_i x_i}{\sum_i^n m_i}, \bar{y} = \frac{\sum_i^n m_i y_i}{\sum_i^n m_i} \quad (3)$$

式(3)中, (x_i, y_i) 为长江经济带各行政单元的地理坐标中心, m_i 为各历史时期各行政单元内的国保单位量值。

4. 集中化指数。

集中化指数主要用于评估区域内不同资源要素的专业化程度, 本文采用洛伦兹曲线(Lorenz Curve)分析可以判断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在类型方面的结构化特征¹³。其公式为:

$$I = \frac{C - K}{M - K} \quad (4)$$

式(4)中, C 为国保单位类型的累计百分比之和; M 为完全集合分布时累计百分比之和; K 为完全平均分布时累计百分比之和。值域为 $[0, 1]$, I 值越大则表明类型方面的集中化程度越高。

5.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方法主要用于分析空间资源分异性及其驱动因子, 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可以分析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对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的解释性强度。其公式为¹⁴:

$$q = (N\sigma^2 - \sum_{h=1}^L N_h \sigma_h^2) / N\sigma^2 \quad (5)$$

式(5)中, N_h 和 σ_h^2 分别为国保单位数量和方差; N_h 和 σ_h^2 是第 h 类影响因素的取值和方差; L 为第 h 类影响因素的分类个数。 q 值域为 $[0, 1]$, q 值越大则表明该指标对国保单位数量分布的解释性越强。

二、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的时间态势

(一) 各历史时期的国保单位分布

国保单位本体的形成时期是界定其历史价值的核心因素。在时间层面, 根据中国历史演进顺序, 可将长江文化带国保单位的形成时期分为远古、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和民国至今这 18 个时期。从图 1 可见, 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国保单位数量极不均衡, 呈现出七次高峰和六次低谷。其中, 远古、周、汉、南北朝、唐、宋和清 7 个历史时期是形成国保单位的高峰, 其中清代是历史峰值, 占据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总数的 24.7%。夏、秦、两晋、隋、五代十国和元 6 个历史时期处于形成国保单位的低谷, 其中形成于夏、秦、两晋、隋四个历史时期的国保单位数量均在个位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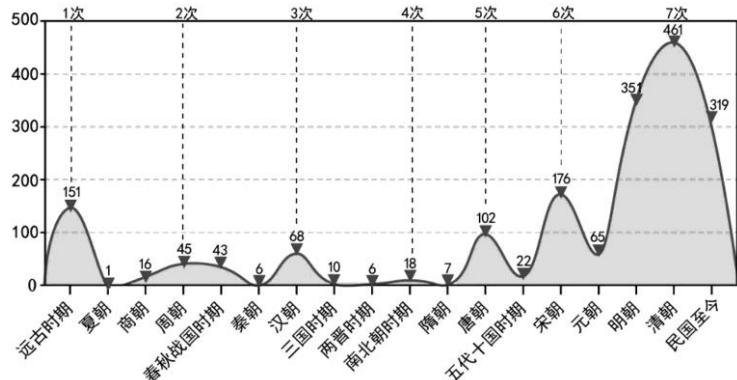


图 1 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各历史时期数量分布图

图 2 显示，形成于远古时期的国保单位分布以长江中、下游为代表，数量 151 处，其中古遗址占 146 处。长江中游以新石器时期的屈家岭遗址、石家河遗址、玉蟾岩遗址、彭头山遗址等距今 4600—10000 年的古遗址为主，已有最早的水稻耕种痕迹，奠定了荆楚文化的稻作农业文化基础。长江下游以良渚遗址、草鞋山遗址、赵陵山遗址等距今 4300—5300 年的古遗址为主，现存大量陶器、石器、竹木器和玉礼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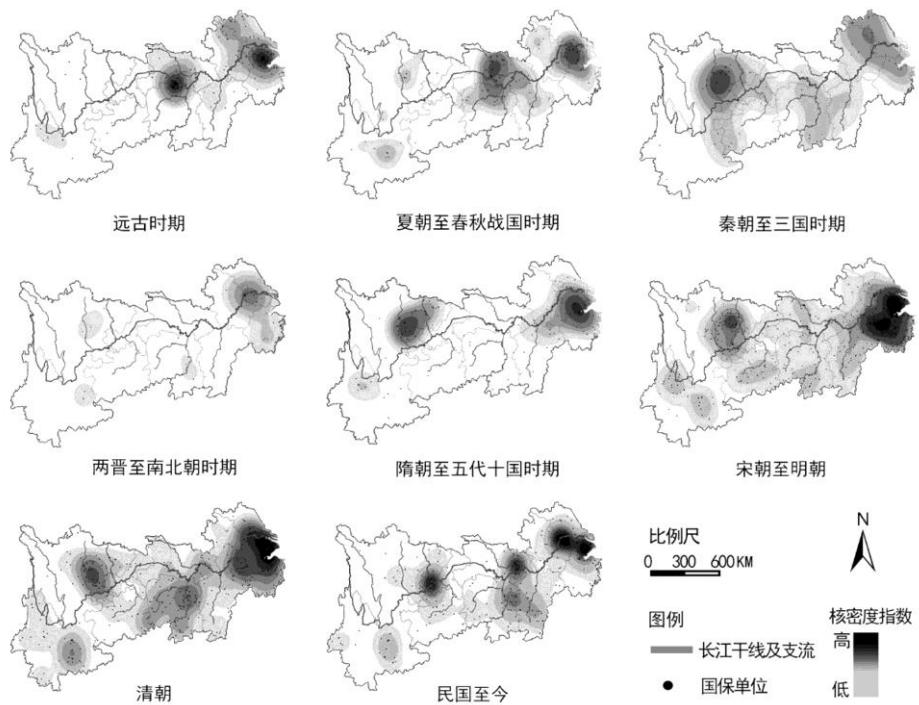


图 2 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各历史时期的核密度分布图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CS(2016)1612)绘制，底图无修改。

夏朝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国保单位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数量 105 处，以 61 处古遗址和 38 处古墓葬为主。其中长江中游湖北地区的擂鼓墩古墓群、仙水岩崖墓群等反映了这一时期楚文化的繁荣，而长江下游地区的阖闾城遗址和绍兴越

国贵族墓群是吴越文化兴盛的见证。

秦朝至三国时期形成的 84 处国保单位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皆有分布，仍然以古遗址、古葬墓为主。其中，郢城遗址、四川都江堰、云南可渡关驿道等古遗址是秦代中南、西南地区人口迁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证，而川西地区的 11 处汉墓群和 6 处汉阙则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高超的建筑技术及石刻技艺。

两晋至南北朝时期形成的 24 处国保单位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如大佛寺石弥勒像、千佛崖石窟等佛教遗存，以及寿州窑遗址、宜兴窑址等生产遗存，反映了这一时期江南佛教文化的兴盛和瓷文化的兴起。

隋朝至五代十国时期形成的 24 处国保单位主要分布于长江上、下游地区，是中国石窟寺及石刻发展的高峰。在长江上游蜀地有南龛摩崖造像、乐山大佛、皇泽寺摩崖造像等遗存，南诏地区则塔寺林立，有崇圣寺三塔、大姚白塔等。在长江下游地区，则以 16 座佛塔和经幢为代表，如龙兴寺经幢、苏州云岩寺塔、安吉永安寺塔等。

宋朝至明朝形成的 592 处国保单位主要集中于长江上、下游地区。石窟寺及石刻等佛教遗存依然占据优势，但古建筑、古遗址数量亦有明显增长，出现了宋元粮仓遗址、天目窑遗址、俞源村古建筑群等生产性和生活性遗存。此外，狮子林、瞻园、寄畅园、拙政园等古典园林遗存大多形成于这一时期，彰显了江南园林文化的盛况。

形成于清朝的 462 处国保单位广泛地分布于长江上、中、下游各地，类型也趋于多样。其中古建筑占 307 处，特色性的地方民居较多，如俞樾旧居、贾氏盐商住宅、杨家湾老屋等。此外，在“西学东渐”的现代文化冲击下，还有 136 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广泛分布于长江沿线的重要城镇，如浦口火车站旧址、圣三一基督教堂、上海外滩建筑群、江北天主教堂等。

民国至今形成的 319 处国保单位在长江上、中、下游均呈现显著的集聚现象，主要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全面反映着近代以来政治革命、工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历史风貌，如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重庆抗战兵器工业旧址群、茂新面粉厂旧址等，反映出时代变革对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形成的重要推动作用，使其分布广、影响范围大，意义深远。

由远古时期的古遗址到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梳理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发展演进，可以窥见其与长江流域各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密切关系，较为符合不同历史时期长江的流域文化在长江文化生态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从某种程度上，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历史分布实际上是一部历时性的长江文化微缩演进史（见图 2）。

（二）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分布重心

图 3 的重心迁移模型分析显示，形成于各历史时期的国保单位重心分布与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紧密相关，即国保单位标准差椭圆长轴方向与长江主要流向相一致。在时段划分上，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的重心迁移轨迹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远古时期至周朝，重心集中于长江经济带整体重心的东北部，趋向短距离重心迁移。第二阶段为春秋战国时期至唐代，重心迁移以远距离为主：春秋战国时期至秦朝和汉朝，重心迁移由中心向西南，再折回中心；汉朝至三国时期，重心迁移由中心向东南；三国时期至两晋、南北朝时期，重心迁移由东南向中心；南北朝时期至隋、唐，重心迁移由中心向东北再折回。这一阶段国保单位重心的变化较大，与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扩张¹⁵、秦朝对西南地区的开拓¹⁶、魏晋时期中原文化的衣冠南渡¹⁷、南北朝江南地区和隋唐时期西南地区的佛教兴盛等重大历史变迁相关¹⁸。第三阶段为五代十国时期到民国至今，重心趋于平稳，徘徊于长江经济带整体重心周边，以短距离的西南方向移动为主，与这一阶段南方经济和文化的持续性优势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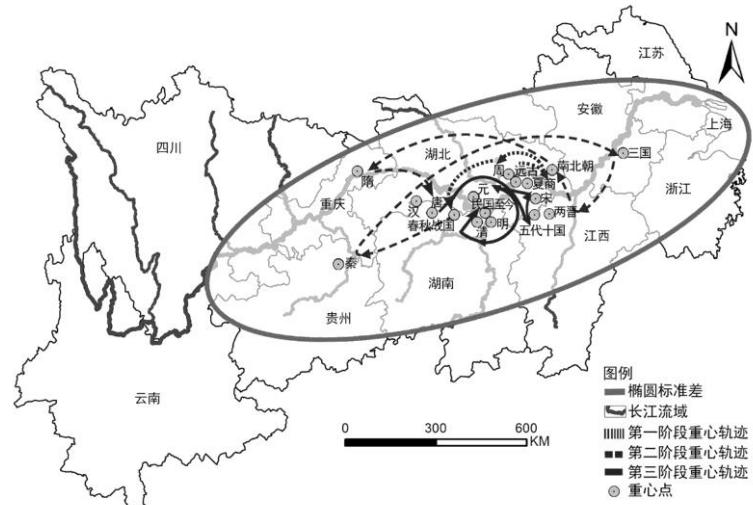


图 3 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各历史时期重心分布图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CS(2016)1612）绘制，底图无修改。

三、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的空间态势

(一) 区域和省域的国保单位空间分布

通过 ArcGIS 软件的点状核密度分析显示，长江经济带的国保单位分布具有典型的面状集聚特征，呈现出沿长江干流和支流“东密西疏”的鱼骨状分布。鱼头部分为国保单位高密度聚集的核心区，主要为长三角的环太湖地区，两翼分别向苏北、淮南和浙南辐射。鱼尾部分的国保单位聚集较为稀疏，以云南昆明和大理为两翼中心。中间的三组国保单位聚集区自西向东依次为以四川成都和贵州贵阳为中心的川-黔两翼、以湖北荆州和湖南长沙为中心的鄂-湘两翼、以湖北武汉和江西南昌为中心的鄂-赣两翼，其中以成都平原及其周边的国保单位最为聚集（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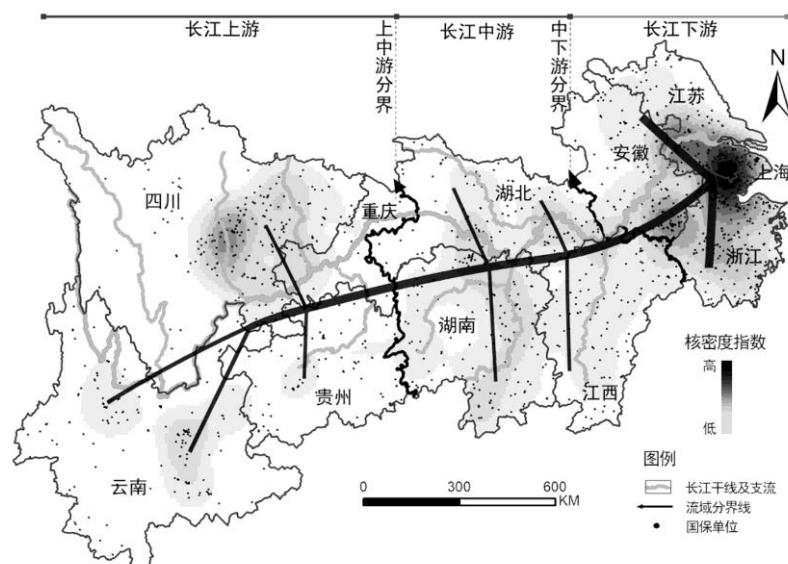


图 4 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区域核密度分布图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CS(2016)1612）绘制，底图无修改。

在区域层面，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国保单位数量分别为 573、553 和 742 处，其中下游国保单位数量最多，占总数的 40.30%，而上游和中游差距不大。在省域层面，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国保单位的数量分布极不均衡：浙江省以 280 处居于首位，占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总数的 15.21%；四川、江苏、湖南的国保单位数量均超过 200 处，分别为 268、249 和 226 处；贵州、重庆、上海的国保单位数量均不足 100 处，分别为 80、57、40 处，合计占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总数的 9.61%，其中上海仅占总数的 2.2%。

（二）水域缓冲区的国保单位空间分布

通过 ArcGIS 软件的线状缓冲区分析显示，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与水域辐射范围具有相关性。从表 1 可见，长江干流两侧 2km、10km、20km、30km、40km 范围内的国保单位数量分别为 76、142、204、246、286 处，分别占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总量的 4.13%、7.71%、11.08%、13.36%、15.53%。长江干流与一级支流（岷江、嘉陵江、乌江、汉江、雅砻江、湘江、沅江、赣江等）两侧 40km 范围内的国保单位 475 处，占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总量的 25.80%。

在区域层面，长江经济带上、中游地区水域两侧 2km 水域缓冲区范围内的国保单位数量较多，占总数的 88.89%，表明了这些国保单位在步行尺度内与长江水域密切相关，以四川、重庆和湖北为代表。此外，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水域两侧 10—40km 的国保单位的数量最多，其 10km、20km、30km、40km 水域缓冲区范围内的国保单位数量分别占到总数的 49.82%、47.62%、45.22% 和 44.63%，相较于上、下游地区，表明这些国保单位在纵深尺度上与长江水域相关性更强（见表 1）。

表 1 长江经济带水域缓冲区的国保单位数量分布

类型		2km	10km	20km	30km	40km
水系	长江干流	76	142	204	246	286
	长江一级支流	59	129	154	172	189
区域	长江上游	62	90	103	114	132
	长江中游	58	135	170	189	212
	长江下游	15	46	84	115	131

四、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的类型特征

（一）国保单位类型分布的结构化特征

在国保单位类型分布的集中化程度方面，图 5 的洛伦兹曲线显示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类型的集中化指数为 0.45，表明各类型国保单位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现出集中的结构特征。其中古建筑明显在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中居于优势地位，数量为 806 处，占总量的 43.54%；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古遗迹的数量较多，分别为 452 和 327 处，分别占总量的 24.42% 和 17.67%；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类的数量较少，分别为 138 和 128 处，分别占总量的 7.46% 和 6.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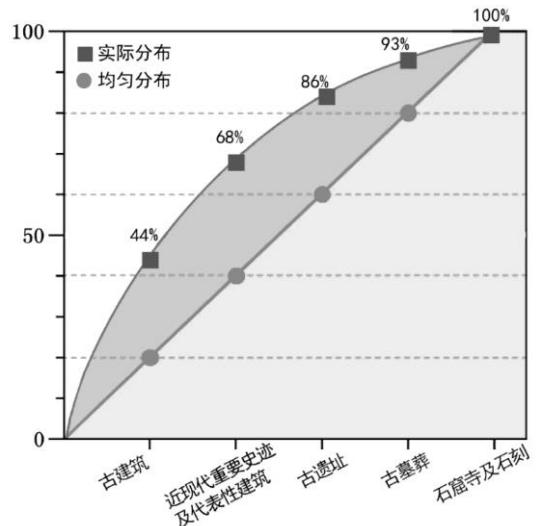


图 5 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类型分布的洛伦兹曲线图

(二) 区域和省域的国保单位类型分布

在区域层面，图 6 的点状核密度分析显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各类国保单位分布均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性：其中古遗址类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鄂北-湘南、苏南-浙北等地呈现片状分布；古墓葬类在各区域均有分布，以苏南-浙北-皖南地区的片状分布和川南地区的点状分布为主；石窟寺及石刻类主要分布于长江上、下游地区，在川西、川南一带和长三角地区高密度集聚；古建筑类虽然在各区域均有分布，但在长三角地区的苏南-皖南-浙江全境分布最为集中；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在长三角地区呈现出高密度聚集，在长江中、上游的鄂、湘、渝地区则呈现出点状集聚。以上分析显示，长江上游以四川为代表地区的古墓葬类、石窟寺及石刻类、古建筑类具有区域集聚性，长江中游以湖北、湖南为代表地区的古遗址、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具有区域集聚性，而长江下游以浙江、江苏为代表地区的各类国保单位都具有集聚性，尤其以古建筑类为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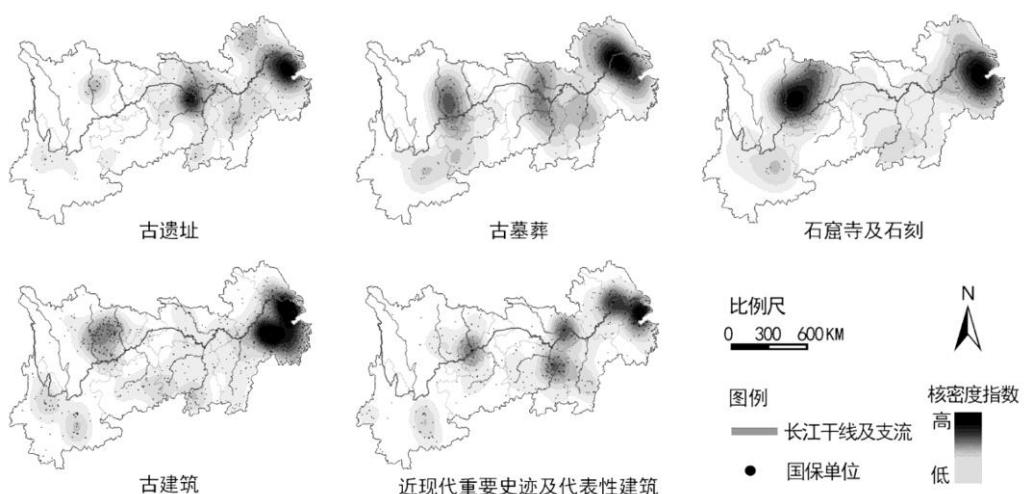


图 6 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各类型的核密度分布图

注：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CS(2016)1612）绘制，底图无修改。

表 2 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各类型的省域分布

区域	省份	古遗址	古墓葬	石窟寺及石刻	古建筑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占比（%）
长江上游	重庆	7	2	5	10	33	3.1
	四川	27	23	38	141	36	14.3
	贵州	8	10	1	39	21	4.2
	云南	21	10	15	80	40	9.0
长江中游	江西	31	10	6	67	45	8.5
	湖北	52	16	7	47	46	8.9
	湖南	52	17	11	79	66	12.1
长江下游	上海	6	1	1	5	26	2.1
	江苏	45	20	15	105	61	13.3
	浙江	46	14	21	146	47	15.0
	安徽	32	15	8	87	31	9.2

在省域层面，从表 2 可见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类型分布同样呈现出集聚性：古遗址类湖北和湖南最多（均为 52 处），上海最少（6 处）；古墓葬类四川（23 处）和江苏（20 处）较多，而重庆（2 处）和上海（1 处）最少，其他省在 10—17 处之间，差距不大；石窟寺及石刻类四川（38 处）和浙江（21 处）较多，上海最少（1 处），其他省市在 5—15 处之间；古建筑类数量最多的前三个省为浙江（146 处）、四川（141 处）和江苏（105 处），重庆（10 处）和上海（5 处）两市最少，其他省在 39—87 处之间；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数量最多的是湖南（66 处）和江苏（61 处），其次是浙江（47 处）、湖北（46 处）、江西（45 处），其他省市的数量则在 26—36 之间，相对较少。总体而言，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和四川的国保单位在类型丰富性和数量上均具有优势，而重庆、上海、贵州、江西等省市两者都相对欠缺。

五、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及解释力

先前的研究显示，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与延续总是与地域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¹⁹。为探索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国保单位分布的关键影响因素，本文在梳理了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影响国保单位时空分布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作为评价维度。其中自然环境维度包括地形地貌、水系、气候 3 个指标及 11 个评价指标，社会环境维度包括经济因素、人口因素、交通水平、历史环境、文化因素、教育因素 6 个指标及 20 个评价指标。通过地理探测器方法计算不同指标对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差异的影响及解释力。

地理探测器分析的因子解释力 q 值显示，不同维度和指标对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时空分布差异的影响力各不相同（见表 3）。整体而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国保单位分布差异都具有重要的解释力，除地形地貌外，其余指标的 q 值均大于 0.5。相较而

言，社会环境较自然环境的影响力更大，体现了文化、教育、经济等区域性社会环境指标对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差异的重要影响。

表 3 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及解释力

维度	指标	评价指标	q 值
自然环境	地形地貌	平原、丘陵、山地、高原、水域面积占比、海拔等	0.429
	水系	河流数量、水系长度等	0.648
	气候	年平均气温、年日照时长、年降水量等	0.531
社会环境	经济因素	人均 GDP、第三产业 GDP、工业化指数等	0.591
	人口因素	总人口、城镇人口比例、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等	0.581
	交通水平	铁路、内河航道和公路里程等	0.596
	历史聚落环境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和名村数量等	0.511
	文化因素	博物馆数量、公共广播和电视节目套数、出版企业数量、文化产业质量排名等	0.652
	教育因素	普通高等学校数、本专科在校学生数等	0.644

在自然环境方面，以河流数量和水系长度为评价指标的水系因素具有最强的解释力(0.648)。这是由于长江经济带密布的江河有助于发展农耕经济、交通航运，形成城镇、村落，因而为各个历史时期国保单位形成提供“因水而兴”的自然基底。如流域面积大于 50km^2 的河流数(2816条)及水系长度(95422km)均居于长江经济带首位的四川地区，其国保单位数量居于各省市前列。地形地貌因子对国保单位分布差异的解释力相对较低(0.429)，其主要原因是平原、丘陵等地貌和低海拔地区人类活动频繁，有利于生成国保单位但不利于保存，而山地、高原等地貌和高海拔地区则相反，因而不能简单以地形地貌特征来判定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分布差异。此外，气候因素对国保单位分布差异亦具有较强的解释力(0.531)，气候宜人的地区，国保单位分布较多。

在社会环境方面，各个指标对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差异的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文化因素>教育因素>交通水平>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历史聚落环境。其中文化因素是国保单位的基底，它对国保单位分布差异的解释力最大(0.652)。从历史演进来看，在文化富集的地区更容易生成国保单位，而文化大省和强省在发掘和保护文化遗产方面也更具优势，江苏、浙江、四川便是两者兼具的代表性地区；教育因素(0.644)、交通水平(0.596)、经济因素(0.591)和人口因素(0.581)对国保单位分布差异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其原因是这些因素对于国保单位修复、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如长三角地区在文化资源保护和研究方面更为重视，资金的绝对投入、技术研发水平、交通便捷性等基础条件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此外，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街区和名村为代表的历史聚落对国保单位分布差异同样具有解释力(0.511)。历史聚落的规模和原真性与国保单位分布数量相互依存，即历史风貌完整的大尺度历史聚落为国保单位保护提供了整体的文化生态环境，因此国保单位数量普遍较多，反之亦然。但还有大量国保单位零散分布于非历史聚落的城镇或村落，这是历史聚落环境对国保单位分布差异解释力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

六、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分布规律与启示

(一) 分布规律

本文通过空间地理分析和数理统计对长江经济带 1851 处国保单位分布的时间态势、空间态势和类型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在时间态势方面，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源起于远古时期而鼎盛于清代，分布数量呈现出“远低近高”的波状起伏。且每一历史时期均有代表性类型呈现，如古遗址类主要分布于远古时期，古墓葬类主要分布于春秋、汉朝和明代，石窟寺及石刻类主要分布于唐、宋时期，古建筑类主要分布于明、清时期，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则主要分布于民国时期。此外，以唐朝、清朝为转折点，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分布重心呈现出从短距离迁移至远距离迁移，再至短距离迁移的阶段性变化。比照先前研究发现，国保单位生成的历史时期、时代和类型耦合性、结构重心与长江流域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格局、人口迁移路径、文化和经济中心和大体一致²⁰。

其二，在空间态势方面，国保单位沿长江水系鱼骨状分布，呈现出“东密西疏”的面状聚焦。在区域和省域层面，长江经济带的国保单位数量分布极不均衡。其中上游地区国保单位数量多且集聚，浙江、四川、江苏、湖南等省的国保单位呈现出数量优势的强集聚性，而贵州、重庆、上海等省市呈现出数量较少的弱聚焦性。从长江水域两侧的缓冲区分析来看，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分布明显呈现出亲水的相关性，其中长江干流优于支流，中、上游地区国保单位在步行尺度内与长江水域相关，中游地区国保单位在纵深尺度上与长江水域亦相关联。

其三，在类型分布特征方面，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类型分布具有集中化的结构特征，五种类型在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分布均呈现出集聚性。其中石窟寺及石刻类聚集于长江上、下游地区，古建筑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类，主要聚集于长三角地区，而古遗址类和古墓葬类在各个区域均有聚集。

其四，在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分布差异的归因分析方面，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均具有重要影响力。其中自然环境因素中水系的影响力最大，社会环境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力最大。历史聚落环境在理论上对国保单位集聚具有高解释力，但由于长江经济带大量的国保单位零散分布于非历史聚落中，因而在本研究中其解释力较低。

(二) 启示

国保单位是中国已核定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最高保护级别，是地域性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和重要史证。根据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分布态势和归因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可以对未来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的保护及传承提供启示：

一是利用时间、空间和类型集聚效应优势，立足于协同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因时、因地和因类而异的空间集聚特征，应打破行政和部门边界，通过集聚效应实现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时间连续、空间连通和类型联动的协同保护及传承，实现专业高效的集群化统筹，以避免各自为阵的低效和冗余管理。

二是强化国保单位本体与生成环境互动，致力于活化发展。遵循长江经济带的国保单位形成和延续的客观规律，通过固本强基的环境治理提升国保单位依存的宏观与微观环境，强化国保单位和长江水系的联系，保护快速城镇化地区国保单位的外围环境，促进落后地区的文博事业及文化产业发展等，以避免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固化和僵化。

三是突破时间、空间和类型分布固化短板，着力于数字化传承。重视现代技术和方法在长江经济带国保单位传承中的应用，除采用三维扫描技术、虚拟修复等数字技术进行国保单位保护外，建议采用 VR 技术、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国保单位与动漫、旅游和影视等文化消费产业的跨界融合，形成国保单位在元宇宙时代的数字化延续和创新发展。

注释：

-
- 1 毕浩浩:《论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创造性转化》,《学习与实践》2021年第5期。
- 2 何婷、成长春:《习近平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要论述的基本逻辑》,《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刘玉博、王振:《长江经济带社会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分异现象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 3 秦尊文、贾海燕:《长江经济带文化发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1—22页。
- 4 廖岚钦、胡娟:《长江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时空特征及演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年第5期。
- 5 陶洁怡、董平、周年兴、龚霄、马小宾:《长江经济带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22年第3期。
- 6 徐卫民、曾丽荣:《陕西省文化遗产时空分布格局及形成因素研究——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例》,《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年第3期。
- 7 截至2019年9月26日,国家文物局共公布了八批国保单位,共计5058处。
- 8 国保单位的“其它类”(17处),数量稀少且类型特殊,如采油井、矾矿山及滨海灯塔等,难以在长江经济带进行跨时空和类型比较,因而未纳入本研究的统计范围。
- 9 自然环境维度中,各省市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数据来自当地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信息,“水系”数据来自《中国水利统计年鉴2021》;社会环境维度中,“历史聚落环境数据”中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数据来自国务院所公布的141座名单(截至2022年3月28日),“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和“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数据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于2019年4月1日所公布名单,其中名镇312处,名村487处,“中国历史文化街区”数据来自2015年4月2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30处名录;其余指标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1》。
- 10 Zhang, J., Cenci, J., Becue, V., Koutra, S., Analysis of spatial structu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s in China based on mathematical calculation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2, 29(3) :124–139.
- 11 Zhang, X., Xiang, H., Liu, R.,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music in Xiangxi, central China, Heritage Science, 2022, 10(1) :1–12.
- 12 Shi, H., Yang, Z., Han, F., Shi, T., Li, D., Assessing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for a world natural heritage site:a case study of Bayanbulak in China, Polis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2015, 24(3) :269–283.
- 13 Weng, 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s and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Landscape Research, 2019, 11(1) :33–41.
- 14 Li, J., Xia, J., Zuo, Y., Cui, J., Qiu, Q., Liu, X., Zeng, H.,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culture, sports, and tourism industries:the case study of China,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2021, 23(9) :1–13.

-
- 15 郭伟民：《从楚国的兴起看长江流域之早期国家文明模式》，《东南文化》1993年第6期。
- 16 黎小龙：《周秦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形成与嬗变》，《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 17 马强：《魏晋之际人口迁移与江南经济的开发》，《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 18 张伟然：《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洪修平：《略论隋唐佛教文化的繁荣》，《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 19 奚雪松、许立言、陈义勇：《中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人文地理》2013年第1期；李亚娟、陈田、王婧、汪德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地理研究》2013年第8期；甘露：《我国民族地区重要文物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基于民族自治地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分析》，《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7期。
- 20 张迪祥、孙平：《长江流域人口与环境关系的历史变迁》，《经济评论》1992年第6期；潘君祥、于顾道：《近代长江流域城市经济联系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